

旺代戰爭與大革命期間的法國認同問題*

林弘毅**

法國多樣性文化所造成的地方特殊性，與近代民族國家意圖建立的想像共同體相違，在大革命期間，透過全民入伍法案的激化以及旺代戰爭的爆發，呈現出法國在舊制度下不為同一體的特徵。對「大屠殺」議題的爭論，更突顯此一不同質性延續至今依舊存在。經由革命建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法國透過共同的遺忘使法蘭西民族再生，旺代則透過共同的記憶使地方認同凝聚。此二種力量佔據法國認同問題光譜的兩端，持續影響法國歷史上的抉擇與發展。

* 本文初稿曾以〈旺代大屠殺與大革命期間法國認同的建立〉發表於「台灣世界史討論會」第六回(2009年5月16日)，感謝多位學者的評論與建議。本文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與改進建議，文中若有錯誤，文責自負。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關鍵字：法國大革命、旺代戰爭、認同、大屠殺

一、前言

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發生，主要導因於經濟、社會、財政三大問題沒有獲得解決。在舊制度(l'ancien régime)¹受到嚴重衝擊，並開始崩潰的情況下，社會上面臨改變的壓力，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鄉村，不論是在體制、思想，抑或社會、日常生活層面，都必須面對新舊交替所造成的震盪。

當1793年國民公會因在對外戰爭中兵力不足，決定採行全民入伍(levée en masse)政策後，引起法國各地大小不一的反抗行動，其中以位處法國中西部大西洋岸的旺代省(Vendée)最為激烈，其情形也最為複雜，旺代甚而成爲中西部各反叛勢力的代稱。在戰爭的過程及意義上，不僅牽涉到法國歷史長期以來的地方特殊性與地方、中央之間的對抗，也包含利用屠殺來達成恫嚇與國家認同方式的爭議。

本文寫作的主要目的，不在於強調旺代戰爭的過程中(或法國大革命的進程中)，曾經發生過爲了國家認同的建立而有血腥屠殺的歷史，或譴責法國大革命時期國民公會領導人的罪行，而是要在主流的法國大革命史論述中，提出不同角度的觀點，豐富眾聲喧嘩的歷史視野。²

¹ “régime”本意為政體、社會制度，“ancien régime”則是法國大革命發生後，對1789年以前法國社會制度的代稱，但1789年以前並沒有這一個詞。見：William Doyle, *The Ancien Regim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2nd edition), p. 1.

² 法國大革命時期歷史的呈現，往往著重於其對後世的貢獻與正面影響，如自由、平等、博愛的倡導等。本文所要探討者與法國大革命的美德與正面價值正好處於相對的一面，「在反駁“單音獨鳴”(monoglossia)之語言觀的

二、旺代戰爭的爆發與爭議

旺代戰爭於 1793 年 3 月正式引燃戰火，1794 年 2 月大致遭到政府軍弭平。戰爭爆發的近因是國民公會(Convention)於 1793 年 2 月 24 日，爲了面對歐洲各國組成一個以對路易十六(Louis XVI, r. 1774-1792)被處死，和法國不斷出兵侵略周遭國家爲名義的軍事聯盟，而提出徵召三十萬「志願軍」的法案。遠因則是法國長期以來強烈的地方意識，其所呈現的並非一個統一的法國，而是各地皆保存了獨特的地區性思想³。

國民公會所主導的對外戰爭，以集中於法國東部邊境地區對抗普魯士(Prusse)與奧地利(Autriche)爲主。這對於遠居西部的旺代居民而言，不僅戰場十分遙遠，對幫助在巴黎的主政者打一場與自己無關的戰爭，爲了這些巴黎人宣揚的，所謂國家被入侵的理由而犧牲生命，並非身處旺代的年輕人所願。而且在波旁王朝(dynastie de Bourbon)統治時期，並未有此種總動員式的兵源與物資徵收情形。國家的徵兵法令，在旺代人眼中，其實是「爲革命徵兵」(tirer pour la révolution)⁴。

因此，旺代戰爭的爆發，最初僅止於地方意識(l'idée locale)與整體意

前提下，“眾聲喧嘩”的裡面亦可及於我們對文化、歷史、政治等範疇的再思考」。引文見：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台北：麥田出版，2001)，頁56，註165。

³ 此處所提地方意識與地區性思想，主要指涉共享的文化空間，包含生活經驗、宗教信仰與歷史記憶等，在受到外力壓迫時更為明顯，詳見第三節討論。

⁴ Jean-Clément Martin, *Blancs et bleus de la Vendée déchirée* (Paris: Gallimard, 1986), p. 40.

識(l'idée universelle)的對抗，特別是農民對抗「愛國者」(les patriotes)的形象。農民所保護的是自己的故鄉，愛國者所捍衛的是其在巴黎所創建的「祖國」(la patrie)。⁵這種地方與中央的對抗，在法國歷史上並不特殊，各地的文化差異、地理因素阻隔、方言使用及地方利益等問題，本就塑造許多不同的地方意識。

然而，旺代戰爭由地方與中央的對抗，轉型成為保王與共和的爭鬥，主要在於摻入了各方角力的不同因子。原先旺代居民所組的隊伍，其組織性與號召力並不強，只是一種簡單的保護家園、保護自身權益的民兵形式，基本上無法與政府的正規軍隊相比。但是在宗教與保王派貴族的加入後，其影響力日漸擴大，並曾擊敗政府軍，向外省推進，甚而威脅法國中西部通往巴黎的要道。

保王派貴族的加入並不令人意外，旺代戰爭不是他們的第一次行動，而且旺代居民的保守性格，特別是舊制度所遺留下來的傳統，對旺代人而言仍舊十分熟悉。尤其是當地的貴族以領主的身份重新回到旺代，仍然能夠以當初帶領領地農民狩獵的方式，將旺代人帶到前線去作戰，⁶即可見

⁵ 「愛國者」與「祖國」為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的用語，見：林弘毅，〈旺代戰爭與羅馬公教〉(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頁55。巴黎的愛國者，即共和政府，取代了王室的位置，承繼中央集權的作法，對其治下的人民汲取資源。相對的，農民過去向當地領主或國王發動集體抗爭，此時便改為向中央或國家機器代理人對抗。見：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著，劉絮愷譯，《法國人民抗爭史》(*The Contentious French*)上冊(台北：麥田出版，1999)，頁14-15。

⁶ 雷蒙·瓊納斯(Raymond Jonas)著，賈士衡譯，《法蘭西與聖心崇拜》(*France and the Cult of the Sacred Heart: An Epic Tale for Modern Times*) (台北：麥田

得雖然革命在摧毀舊制度後給予當地人民利益(如取消過去欠領主的債務)，但並沒有收得民心的顯著效果。

羅馬公教的介入，則使問題顯得較為複雜。旺代在舊制度底下，是一個羅馬公教信仰相當深厚的地區。其中，本堂神父做為教區的核心人物，平日在教堂中，主要的工作為祝聖儀式，包括出生的聖洗聖事、結婚的婚配聖事、死亡的臨終聖事以及彌撒等，代表著上帝對人民的觀護。⁷對一般人而言，最重要的宗教事務便是在禮拜天到教堂聽本堂神父講道。⁸講道時所傳達的，不僅是上帝的話語，也時常代為宣讀國王或官方的文告，因此本堂神父是教區的主要消息來源，也因為握有宣傳工具而被啓蒙思想家稱為「永遠的煽動者」(l'éternel provocateur)。⁹

旺代做為鐘聲文化(l'esprit du clocher)¹⁰根深蒂固的地區，羅馬公教的動向便顯得舉足輕重。1790年《教士的公民組織法》(Constitution Civile du

出版，2003)，頁166。

⁷ Bernard Plongeron, *La vie quotidienne du clergé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974) p. 241.

⁸ Yves Marie Bercé,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The Social Origins of Rebellion in Early Modern France*, trans. by Amanda Whitmo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 24.

⁹ Bernard Plongeron, *La vie quotidienne du clergé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pp. 261-262.

¹⁰ 指羅馬公教滲透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除每日的作息受到鐘聲的制約外，活動、節慶、婚喪等，也都與教堂有所連結。鐘可以是禮拜彌撒的通知，可以是緊急危難的呼叫，更是人民生活所依循的時間系統。法國史學家Alain Corbin認為鐘形成了一個音響空間，以和諧的聲音劃出一個受到限制的區塊，型塑集體的感官文化，並為固定的地方意識而服務。見：Alain Corbin, *Village Bell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95-97.

Clergé)的通過，要求神職人員必須對法國共和政府宣誓效忠才能繼續活動，引發羅馬公教在法國的分裂。其中，旺代的拒宣誓派教士(les prêtres réfractaires)在比例上不僅超過一半，且遠高於其他省分。¹¹當旺代戰爭爆發時，這些被迫地下化的羅馬公教神職人員便乘機發揮其影響力，與旺代反抗軍結合，互相利用以對抗來自巴黎的壓力。職是之故，旺代軍的稱呼改為「王室與公教軍」(l'armée royale et catholique)，其標誌統一以聖心(sacré-coeur)為象徵，並寫有「上帝與國王」(Dieu et Le Roi)字樣，其宗旨為「支持我們神父的宗教，還給路易十七……光輝與穩固的王權」(“soutenir la religion de nos pères et rendre à Louis XVII... l'éclat et la solidité de son trône”)。¹²在政治與宗教的介入下，旺代的反抗已經完全走樣。

旺代戰爭過去被視為是共和政府以代表全國人民的「人民革命」(la peuple-révolution)戰勝僅代表貴族與神職人員階級利益的「貴族、神職人員反革命」(la nobles-clergé-contre-révolution)刻板印象¹³，即由於旺代戰爭的轉型，過度強調了宗教與貴族的目標，而忽視旺代戰爭最初爆發的原因，在於反抗徵兵去外地作戰的地方意識，以及法國歷史上地方與中央長期對立的傳統。

相對於旺代反抗意義的轉型，巴黎的統治者卻有更多的理由可以用來

¹¹ Charles Tilly, *La Vendée* (New York: Wiley, 1967), p. 240.

¹²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aris: Seuil, 1987), pp. 107-108.

¹³ Gérard Cholvy, “Les peuples de France entre religion et révolution (1760-1830),” dans Jean-Clément Martin (dir.), *Religion et Révolution* (Paris: Anthropos, 1993), p. 11.

打擊旺代軍，前述貴族與神職人員反革命的說法即為其中之一。旺代以一省之力與巴黎相對抗，當巴黎正忙於面對外敵時尚有可發展的空間，但一俟外敵被擊敗，旺代軍便無可避免地面臨失敗的命運。

在旺代軍逐漸退敗的過程中，政府軍開始在佔領區實行兩項不甚光明但絕對有效的政策：其一為「去基督宗教」(la déchristianisation)政策，其二為「減少人口」(le système de dépopulation)政策。這兩項政策也是近年來法國大革命中是否有「大屠殺」(la génocide)爭論的主要對象。

「去基督宗教」政策分為中央與地方兩個層面，在中央實行者主要為新革命宗教的建立，在地方上則以處決神職人員與摧毀教堂功能為目標。首先是處決在戰場上持有武器的神職人員，¹⁴緊接著將其他神職人員驅逐出境，再將教堂這樣建築物的宗教意義和神聖性徹底去除。不僅教堂的十字架被換成三色旗，鐘聲文化的媒介——鐘，也被拆除改鑄成火砲¹⁵或拍賣。¹⁶

¹⁴ “Les Prêtres sujets à la déportation pris les armes à la main... seront mis à mort.” “N° 899, Décret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des 29^e et 30^e jours du 1^{er} mois de l’an 2 de la République”,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 Vendée(ADV) L662, Police des cultes, 1792- an III, imprimés et manuscrits.

¹⁵ Serge Bianchi, “La déchristianisation de l’an II,”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 233 (Julliet-Septembre 1978), p. 352.

¹⁶ 拉胡德鎮(commune de La Roude)，教堂建物及附屬品，拍賣總價400(單位未註記)；盧濟夫鎮(commune de Lougëve)，教堂建物及附屬品，拍賣總價300(單位未註記)……。見：ADV 1Q 527, Prêtres déportés. Etat de leur biens acquis à la République, an II; état & consistance des biens acquis à la République par la déportation des prêtres réfractaires, dressé en exécution de la loi du 17 sept. 1793, manuscrits.

在去除神聖性的同時，也將舊有的教堂改做政府機關，或者「理性的聖堂、自由的神殿」(temple de la Raison, en sanctuaire de la Liberté)¹⁷，用以崇拜新的革命宗教。至於那些被捕獲的旺代軍士兵與神職人員，除了上斷頭臺公開斬首之外，大多數則是以「愛國式受浸」(la baptême patriotique)的方式被處死。因為公教徒在出生時會接受神父的洗禮，象徵加入教會與獲得拯救，¹⁸所以這些被判處死刑的人犯，就由軍隊押解到河裡，下水接受「受浸」。這些信奉公教的神職人員與信徒，是否在屬靈的世界被拯救，我們並不得而知，但在屬世方面，他們卻再也無法在「受浸」後從水裡上來。

隨著戰事的結束，據與粗略統計，雙方在旺代及其周邊的戰鬥，造成大約六十萬人死亡或失蹤，該地成年男子只剩下戰前的五分之一。¹⁹戰爭所造成的傷亡，不僅在軍隊中，平民百姓也無法避免受到戰火的波及。然而，除了戰爭必然的傷亡之外，國民公會對旺代採取的「減少人口」政策，也被稱為「旺代大屠殺」(la génocide vendééen)，²⁰成為日後人們所詬病的

¹⁷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 240.

¹⁸ 「這水所表明的洗禮，現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這洗禮本不在乎除掉肉體的污穢，只求在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彼得前書》三章二十一節，《聖經》和合本，神版(香港：香港聖經公會，1990)，「新約」，頁338。

¹⁹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The Vendée*, trans. by George Holoch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3), p. 199. 不過這個數字與現實的差距有多少，並不得而知，因為教堂的完整登記資料僅至1792年，而政府的普查工作則是到共和曆9年(1801-1802)才開始。

²⁰ Reynald Secher, "Introduction," dans Gracchus Babeuf, *La guerre de la Vendée et le système de dépopulation* (1793, Paris: Tallandier, 1987, reimprimé), p. 11.

革命污點。

政府軍的部隊主要採取焦土政策，只要在行軍的動線上有任何的聚落，特別是較為大型的市鎮，所到之處大肆屠殺，不容許有任何人或牲口存活，所有的生產工具(如磨坊等)也必須摧毀，使其無法再做為反抗勢力的集結點²¹。如果在行軍時遇到人群，那就必須立刻當作敵人或間諜直接槍斃²²。在焦土政策下，軍隊所到之處燒殺擄掠，居民大多聞風逃至鄰近的森林，原有的存糧也被軍隊劫掠一空，不僅居民沒有辦法再依賴聚落生存，游擊隊也失去了補給的據點。

其後，國民公會仍然沒有以焦土政策為滿足，他們希望更進一步讓旺代永遠無力反抗中央。時任旺代西部政府軍指揮的屈侯將軍(Baron Louis-Marie Turreau, 1756-1816)，便洋洋灑灑寫了十五條計畫，要讓旺代人沒有能力再度進行反革命的行動。其中前面四條與統治政策相關的內容包括：防止旺代接受任何外來援助；斷絕旺代與其他叛軍之間的聯繫；把拒絕投降地帶的居民全面遷走，因為這些人實際上還是支持叛軍²³；帶走所有農產、牲口與賴以維生的所有物品與工具等²⁴。屈侯將軍的目的，毫不避諱地寫在他的回憶錄中，「就讓他們只能選擇死在叛亂地帶的中心」

²¹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p. 211.

²²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 230.

²³ 屈侯將軍特別附註，指出旺代人在政府軍到達前，便戴上三色旗的標誌，等到政府軍離開，旺代軍到達前，又換上白色的標誌。Louis-Marie Turreau, *Memoir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London: Printing-Office of Baylis, 1796), p. 166.

²⁴ Louis-Marie Turreau, *Memoi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pp. 165-169.

²⁵。他強迫旺代人離開自己的家鄉，如果有不從者，便會被處以同叛軍的刑罰，通常皆為直接處死²⁶。也因此，屈侯將軍認為旺代從此成了一個非常虛弱的省份，虛弱到沒有必要再派兵前來旺代²⁷。

真正被處死的人數並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但在《解決旺代戰爭計畫》(*Moyens de finir la guerre de la Vendée*)中可以發現，軍事調查團自始即並不打算收容犯人。²⁸

法國大革命及其所建立的共和體制，是許多近代民族國家(l'état-nation)學習的對象。但在建構革命史觀與共和體制的同時，卻留下一段屠殺的歷史，引發現代學者的爭論。

旺代戰爭結束後的綏靖行動(約在 1794 年 1 月至 1794 年 7 月)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或失蹤，至今難有定論，一般咸認為在二十五萬至五十萬之間，²⁹但數目多寡並不重要，綏靖的殘酷過程也無庸置疑。爭論的焦點在於大屠殺一詞的使用與其是否有大屠殺的動機。

主要反對使用大屠殺一詞的說法有兩種：一為「大屠殺」帶有種族清

²⁵ Louis-Marie Turreau, *Memoi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p. 165.

²⁶ "... cette preuve acquise, ils seront mis à mort." "N° 899, Décret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des 29^e et 30^e jours du 1^{er} mois de l'an 2 de la République" ADV L662.

²⁷ Louis-Marie Turreau, *Memoi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pp. 191-192.

²⁸ Gracchus Babeuf, *La guerre de la Vendée et le système de dépopulation*, p. 123.

²⁹ Mark Levene, *Genocide in the Age of the Nation-State, V.II: The Rise of West and the Coming of Genocide* (London: I. B. Tauris, 2005), p. 110.

洗的意味，雖然日後許多大屠殺的案例都顯現出模仿「旺代大屠殺」的過程，但因為旺代戰爭是法國人對法國人的戰爭，因此並不符合種族清洗的定義。³⁰一為 1980 年代開始將旺代戰爭後的綏靖工作視為大屠殺，其目的在於為「旺代復仇」(la Vendée-vengée)，企圖以醜化革命的形象，或刻意呈現革命醜化旺代的形象，來為旺代過去在歷史中所受不平的待遇抱屈。³¹

就當時事態的發展而言，巴黎害怕旺代軍會形成一股貴族、教會與王室合體的反革命潮流，並且以此形式席捲法國西北部地區以至全法國，因此採取較為激烈的手段來面對旺代軍。而且，恐怖行為並不只是政府軍的專利，在戰爭的過程中雙方皆有殺害對方非軍事人員的紀錄。³²不過，這樣的說法事實上是在為當時的共和政府開脫，只因為必須保衛法國大革命帶給人們的概念，即這場革命的價值毫無疑問是正直與良善的。³³

誠如前文所述，法國歷史的特殊性在於地方意識的發達，每一個地方都是一個不同的群體。如以多元文化的角度而言，法國各地特殊文化都可以被視為法國整體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被視為整體文化的多元性表現。但在過去並非如此，一場法國人對法國人的戰爭，其意義不僅止於表面上的

³⁰ Mark Levene, *Genocide in the Age of the Nation-State, V.II: The Rise of West and the Coming of Genocide*, pp. 115-116.

³¹ Jean-Clément Martin, "Histoire, mémoire et oubli pour un autre régime d'histoir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N°47-4 (octobre-décembre, 2000), p. 797.

³² 林弘毅，〈旺代戰爭與羅馬公教〉，頁48-50。

³³ Mark Levene, *Genocide in the Age of the Nation-State, V.II: The Rise of West and the Coming of Genocide*, p. 116.

內戰層次。在舊制度之下，法國並不是以一個完整的國家形象呈現在世人面前，法國各地的人民彼此之間很難找出一個共通點，以表現何謂「法國人」的形象。法國歷史長期以來的發展，其特色為各地多樣性的體制，在法國歷史的古典時期以前，中央乏力節制地方權力，³⁴行政體系因為遷就各地方勢力而不一致，混亂脫序的情形隨處可見，造成在社會、政治、宗教等層面上，有過不少激烈的衝突，使法國難以找出同質性。³⁵即便是法國人對法國人的戰爭，其意涵卻是共和政府在消滅一個地方獨特性所衍生出來的叛亂行動。

有關為「旺代復仇」的觀點中，有些學者還提出另一個質疑，即旺代大屠殺在歷史上刻意被遺忘，或者改以「暴行」(les violences)取代屠殺的字眼，其原因不外乎旺代人在旺代戰爭的過程中，不僅被共和政府視為頭號公敵，更被當做革命的敵人，而大屠殺一詞因為被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猶太人的遭遇相連結，為相當負面的用詞，對於法國大革命的道德形象而言，不啻是一種嚴重的傷害。³⁶所以，並不是研究旺代的學者或者旺代人在為旺代復仇而刻意醜化法國大革命的良善外表，而是找回過去刻意保護法國大革命的片面宣傳下，另一條歷史記憶的路線。

特別是當「減少人口」作為一個政策在旺代以政府力量施行時，這種針對非戰鬥人員的大規模殺害或遷移至外省的作法，甚至要把旺代作為

³⁴ 吳圳義，《近代法國思想文化史》(台北：三民書局，2006)，頁86-88。

³⁵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 espace et histoire*, pp. 67-68, 115.

³⁶ Jean-Clément Martin, "Histoire, mémoire et oubli pour un autre régime d'histoire," p. 797.

「國家墓園」的說法，的確為大屠殺的一種形式。³⁷但是如果明確地指出「旺代大屠殺」的存在，無疑地破壞了法國大革命過往的形象，並且對於法國內部認同的建立，也是一個負面的教材。

三、國家認同在旺代的建立

人在認同的選擇上，一向與土地有密切的關係，透過一個被限定範圍區域的生活方式(*le genre de vie*)，來認識與觀看其他的世界，由此來區分他者與自己的群體，是較為常見的說法。也因此，認同觀念時常被誤用，導致排外或種族主義。一旦屬於「我們的地方」被威脅了，眾人就會為了自保而團結起來，開始區分自己人與外人。³⁸所以認同除了是一個區域性概念之外，也是一個共享的文化空間，由生活在同一土地上的人，產生習慣而共享溝通模式。³⁹只有在眾人都分享同一個文化(包含思想、表達、社交、行為與溝通方式的體系)時，才會屬於同一個群體、同一個地方，並建構出集體意識。⁴⁰

因而只要是比成員之間有接觸的範圍更大的一切共同體，都可能是想

³⁷ Adam Jones, "Why Gendercide? Why root-and-branch? A comparison of the Vendée uprising of 1793-94 and the Bosnian war of 1990s,"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8:1 (March 2006), pp. 15-16.

³⁸ 提姆·克雷斯威爾(Tim Cresswell)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頁21-22。

³⁹ 提姆·克雷斯威爾，《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31。

⁴⁰ 艾尼斯特·葛爾納(Ernest Gellner)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頁8。

像出來的。不論這想像是虛假的，抑或有實際背景支撐，都使每一個共同體對內有一致的認同目標，對外以被想像(包含自己發明的想像與他者對自己的想像兩層面)的方式區隔他者與自己。⁴¹這是有限的空間與無限的時間積累結合的成果，成為歷史與記憶的空間。⁴²這便是地方的特殊性，也就是地方意識。

旺代原先只是一個單純的地理空間或行政單位，但是生活在旺代的居民，由於對外交通不便與資訊流通不易，對土地的感情特別濃厚。而以自己對土地的感情，透過生活方式所產生的經驗，加入歷史與記憶，產生一種獨特而共享的文化，建構出屬於自己的觀感。這些文化與觀感和土地緊密結合，就產生同質性，將原先不同的條件，合理化地整合在一起。⁴³這使每個人擁有許多共同的事物，同時也必須已經遺忘許多事情。⁴⁴最後僅保留想像中同質性的部分，也就是旺代的地方意識與被創造出的想像中的旺代(*la Vendée imaginaire*)。⁴⁵

而在大革命時期，法國即面臨如何去定義「法國人」與各地方如何去

⁴¹ 班納迪克·安德森(Anderson, Benedict)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2004)，頁11。

⁴² 提姆·克雷斯威爾，《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68。

⁴³ 艾尼斯特·葛爾納，《國族與國族主義》，頁63。

⁴⁴ Ernest Renan, "Qu'est-ce qu'une nation?" *La Bibliothèque électronique de Lisieux*, http://ourworld.compuserve.com/homepages/bib_lisieux/nation01.htm, 擷取日期：2009年5月5日。

⁴⁵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 188.

面對「法國」這個詞在意義上轉變的問題。

法國人一詞本身也是一種相對性的形容，就如同在旺代省，來自封特奈(Fontenay)，相對於來自呂松(Luçon)；來自法國，要相對的是來自法國以外的地區。如果一個農民一輩子都沒有離開過他所居住的村落，他便無法理解法國人的意涵為何，更不會認為法國人一詞用在他的身上有任何意義。

法國大革命發生後，「國家」(la nation)這個詞出現了不一樣的定義。這裡的國家，指的不是政府機關或權力機器，而是受到政府權力所支配的整個社會體系⁴⁶。當巴黎的執政者試圖區分誰是愛國者時，他們就必須面對祖國(la patrie)與國家的界定問題。⁴⁷所以，國家與國家意識或國家認同，是在革命發生後，被政治層面的意識型態所劃定的，以做為區分自己與外敵的依據。⁴⁸對外，靠著延續數年的戰爭，明顯區分法國與歐洲其他各國的差別。對內，靠著掌控整個社會體系的國家機器，建立超乎各地情感之上，對法國的認同。換言之，國家認同是被建立起來的，是一種想像，建立在不同語言、宗教信仰、生活習慣之上，要求所有的社群都想像自己生活在同樣的文化裡。

法國在封建體系下長期呈現各自為政的現象，在各地方之間，一般沒有稱自己為法國人，常用的詞彙是「我們」(nous)、「我們的」(notre)，

⁴⁶ 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胡宗澤、趙力濤譯，《民族—國家與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台北：左岸文化，2002)，頁19。

⁴⁷ Pierre Nora, "Nation," dans François Furet et Mona Ozouf dirigent,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dées* (Paris: Flammarion, 1992), p. 342.

⁴⁸ Pierre Nora, "Nation," pp. 350-351.

來指稱自己所認同的地方、文化或生活習慣。要讓各地方朝向一致化前進，產生一個想像中的法國⁴⁹，尚有很大的努力空間。即便法國「公民」一詞的意義，也是經由 1789、1793 兩次〈人權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後，在 1795 年〈人與公民的權利義務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et des devoir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才確定。

當然，革命發生後，巴黎的執政者也立刻察覺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因此他們所做的第一步，便是區分何謂法國人與外國人，先把所有他們認為屬於法國的，放在法國這個大框架下，找出同質性。在這個想像的共同體中，表面上呈現的是要以國家力量保護人民，實際上卻是在塑造自己的意識型態。⁵⁰

當時巴黎以國家受到外國入侵為號召，透過發佈全民入伍的法令來試探自己的統治威望。不過這個保護國家的大旗，反倒引起了各地的質疑，到底是保護國家，還是保護巴黎的共和。⁵¹認為是保護國家的地區，被執政當局視為對國家有認同感；而認為是保護巴黎共和者，如旺代及其周邊省份，則被視為是不愛國的反叛行為，遭受出兵征討的命運。這使得國家認同與政治上的意識型態更無法分割，成為一種沙文主義式的國家認同，⁵²非我即敵。

表面上，旺代的叛亂被撫平之後，全法國都回歸到同一個大框架之

⁴⁹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 espace et histoire*, pp. 67-68.

⁵⁰ Michael Rapport,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3), p. 5.

⁵¹ Michael Rapport,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p. 6.

⁵² Michael Rapport,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p. 6.

下，即「唯一且不可分割的法蘭西共和」(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une & indivisible)，⁵³擁有同樣的國家認同。但實際上，各地方在巴黎的壓力下，卻激盪出更強烈的地方意識，對抗巴黎利用國家力量達到中央集權的手段。⁵⁴看似在旺代戰爭後消失的旺代地方意識，便在拿破崙執政後重新浮現。⁵⁵這是因為法國的歷史，本就建立在巴黎與其他地區利益衝突的歷史上。⁵⁶

國家認同這個意識型態的建立，被與巴黎的中央集權劃上等號，受到各地地方意識的挑戰，並非等同各地方欲求獨立於法國之外，而是認同的情感，不希望被遠在巴黎的執政者所操控，不希望巴黎的一道命令，就要改變他們所習慣的生活方式，所認同的地方文化。不是一句簡單的「爲了國家」，就要他們付出自己的生命。

法國大革命帶給法國人的巨大轉變，其中之一便是想像中的國家意識由巴黎傳播到法國各地。旺代人同樣面臨到旺代人與法國人認同之間的抉擇。當國民公會以全民入伍法案要求法國人團結一致面對外侮時，也是測試自己在法國各地的影響力，觀察是否其所推出的國家認同在各地受到廣

⁵³ ADV L395, Levée de 300,000 hommes (loi du 24 février 1793), 1793- an IV, imprimés et manuscrits.

⁵⁴ Alan Forrest, *Paris, the Provinc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Arnold, 2004), p. 223.

⁵⁵ 拿破崙在旺代的重建，在包含羅馬公教的部分，使旺代的地方意識可以再次建立在宗教上。見：Pierre Marambaud, “La religion de vendéens,” dans Alain Gérard (dir.), *Christianisme et Vendée* (La Roche-sur-Yon: Centre vendéen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2000), p. 173.

⁵⁶ Alan Forrest, *Paris, the Provinc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224.

泛的支持。⁵⁷但旺代的狀況，與巴黎所期待的愛國熱誠差距甚遠，巴黎希望可以透過愛國心的鼓舞，來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對抗歐洲各國聯軍的入侵；而旺代則不希望自己成為犧牲品，去幫助遠在巴黎的共和政府，以及本身就有問題的革命。⁵⁸

誠如雨果在《(17)93年》中所說，旺代戰爭是一場「地方精神對抗中央精神」的戰爭。⁵⁹更仔細地說，法國歷史上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巴黎與其他地區的利益衝突。⁶⁰在法國完整建構出一個想像中的民族國家之前，這是一個無解的問題；即便在法國已經成為一個想像中的民族國家後，地方意識也沒有全然消失。

共和政府以大屠殺的方式在旺代進行徹底的摧毀，其所達成的，是把舊制度時期進行許久的中央集權行爲，藉由革命創造的新社會制度來調整與應用，讓這套體系更有系統、更加有效。⁶¹權力歸於中央，國家認同強加於人民之上，瓦解原先地方的社會結構，再用自己的路線去重建，⁶²讓全法國在表面上形成一個整體，每個地區都沒有差別地擁護共和政府與愛國心。去除各地方意識之後，便會出現一股新的精神，去效忠共和政府。

⁵⁷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p. 25-27.

⁵⁸ 雷蒙·瓊納斯，《法蘭西與聖心崇拜》，頁159-160。

⁵⁹ Victor Hugo,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Quatre-vingt-Treize*, Troisième partie, Livre Premier, VII. <http://www.gutenberg.org/etext/9645>, 擷取日期：2009年10月31日。

⁶⁰ Alan Forrest, *Paris, the Provinc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224.

⁶¹ 江金太，《剖析法國大革命》(台北：森大圖書，1989)，頁85。

⁶² 江金太，《剖析法國大革命》，頁88。

使整個法蘭西民族與法國可以獲得「再生」(la régénération)。⁶³地方政治、制度、社會、文化、宗教、生活經驗，一切都被摧毀並取而代之，也要讓法國人認為自己就是專屬於法國人，不是各地方人⁶⁴。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破除舊制度下強烈的地方意識，創造一個具有同樣認同的新人民(le nouveau peuple)⁶⁵，要大家都能做一個愛國的好公民。

對共和政府而言，這是一種集體精神征服個人精神的做法⁶⁶。更進一步，其實是一個超大型的集體精神，要去征服另外一個集體精神。地方上的集體精神，表現在地方意識上，是生活經驗的積累，是歷史與記憶在空間上的沈積，雖然是一種想像的同一性，但歷久而不衰，並繼續往前推進。國家精神當然也是建構出來的，但並不是人民的生活經驗，而是由執政者所推演，沒有實質基礎的思想。雖然國家的集體精神力量遠大於地方，不過地方的集體精神沒有消失，而是沈潛下去，持續累積能量，以延續地方意識。當旺代的居民在保衛故鄉，對抗那些愛國者以祖國為名的侵逼，便又回到法國歷史的最根本之處，巴黎所挾的中央精神與旺代所保護的地方利益相扞格。

⁶³ 劉大明，《「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公民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138-139。

⁶⁴ 劉大明，《「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公民教育》，頁140-142。

⁶⁵ Mona Ozouf, "Régénération," dans François Furet et Mona Ozouf dirigent,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dées*, p. 373.

⁶⁶ 劉大明，《「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公民教育》，頁152。

四、 結論

國家認同的建立，在革命發生後，因為外敵的入侵與國內政局的動盪，成為共和政府努力的目標。然而在全民入伍法案送達旺代之後，所激起的不是為了國家犧牲奉獻的愛國心，反倒是質疑為何要到一個不認識的地方，去與可能未曾聽聞的國家作戰。

旺代雖然不是唯一反抗此一法案的省分，但卻是反抗最激烈，時間持續最久的地方。在近一年的戰爭中，旺代反抗軍的成分，除了受到地方意識的鼓動之外，還加入了貴族與公教的力量，並曾經撼動巴黎的統治者。為此，在旺代戰爭結束前後，共和政府為了消弭旺代的反抗能量，不僅在該省加強落實「去基督教化」政策，將公教信仰的力量從人民身上除去，消滅鐘聲文化與地方意識結合的傳統，也同步實行「減少人口」政策，將人與土地切割。

旺代戰爭與過去的內戰不同之處在於，這既不是一場宗教戰爭，也不是國王與地方封建勢力的對抗，更不是單純的農民叛亂。旺代戰爭代表的是共和政府以法蘭西人民的代表自居，以人民革命的國家力量來回應地方獨特性的訴求，並且傾國家之力，意圖消滅旺代所依憑的地方意識來建立國家認同。換言之，「旺代大屠殺」的目的，就是為了「國家的理由」(la *raison d'État*，其實是為了共和的理由)。⁶⁷因此在國家大纛之下，共和政府

⁶⁷ “raison d'État” 一詞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有不同的意義，本文取其較為貼近法國史的解釋，“raison”即「為了共和所需所足」(*nécessaire et suffisant pour la république*)，“état”即「屬於共和的領土觀點」(*l'aspect territorial de la république*)。見：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Paris: Seuil

所採用的方式也與過去王室對內戰的處理方式不同，以極其高壓與殘酷的屠殺行爲，在不消耗盡國家力量來解決國內所有反叛情緒的情況下，選擇旺代作為武力貫徹國家意義的示範，做出殺雞儆猴的效果。正如同路易十六必須上斷頭臺，以維護國家的生存一般，旺代也必須面臨屠殺的命運，才能消滅反國家的行動，建立起一個團結的法國。⁶⁸

透過屠殺的方式，共和政府對旺代的控制在戰後曾有一段長時間的穩固統治，一方面因為人口大量銳減，難有大規模的反叛出現；一方面因為鐘聲文化所仰賴的土地與人民剝離，傳統的生活經驗與模式難以再形成有效的集體精神，以對抗國家認同集體精神的侵逼。

大屠殺在旺代是否曾經實行過的爭論至今未休，但眾所承認的是在旺代的確有過爲了「國家的理由」而出現的殘酷暴行。大屠殺的爭論因為與法國文明以及法國大革命的美德相掛勾，因此學界爲了是否使用大屠殺一詞或僅以暴行形容旺代戰後共和政府的政策，看似暫時無法有一完滿的結果。

但回到國家建構的要素上，在歷史的選擇裡，刻意去記憶或遺忘對歷史都是一種傷害，也是歷史的危機。或如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於 1882 年德法戰爭(la Guerre Franco-Allemande)結束十餘年後，在索邦大學發表演說〈什麼是國家？〉(“Qu’est-ce qu’une nation?”)時所言：「所有法國公民都必須已經遺忘……」(tout citoyen français doit avoir

/ Gallimard, 2004), p. 262.

⁶⁸ Mark Levene, *Genocide in the Age of the Nation-State, V.II: The Rise of West and the Coming of Genocide*, p. 159.

oublié...) ⁶⁹。惟有如此，才能在沒有同質性的情況下，建立起相同的國家認同。

⁶⁹ Ernest Renan, “Qu’est-ce qu’une nation?” *La Bibliothèque Electronique de Lisieux*,
http://ourworld.compuserve.com/homepages/bib_lisieux/nation01.htm, 擷取日期：2009年10月31日。

參考書目

一、史料

1. ADV 1Q527, Prêtres déportés. Etat de leur biens acquis à la République, an II; état & consistance des biens acquis à la République par la déportation des prêtres réfractaires, dressé en exécution de la loi du 17 sept. 1793, manuscrits.
2. ADV L395, Levée de 300,000 hommes (loi du 24 février 1793), 1793- an IV, imprimés et manuscrits.
3. ADV L662, Police des cultes, 1792- an III, imprimés et manuscrits.
4. Babeuf, Gracchus. *La guerre de la Vendée et le système de dépopulation*. Paris: Tallandier, 1987, reimprimé.
5. Turreau, Louis-Marie. *Memoi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London: Printing-Office of Baylis, 1796.

二、史料

1. 《聖經》，和合本，神版，香港：香港聖經公會，1990。
2. 安東尼·紀登斯(Giddens, Anthony)著，胡宗澤、趙力濤譯，《民族—國家與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台北：左岸文化，2002。
3. 江金太，《剖析法國大革命》，台北：森大圖書，1989。
4. 艾尼斯特·葛爾納(Gellner, Ernest)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

5. 吳圳義，《近代法國思想文化史》，台北：三民書局，2006。
6. 查爾斯·提利(Tilly, Charles)著，劉絮愷譯，《法國人民抗爭史》(*The Contentious French*)上冊，台北：麥田出版，1999。
7. 班納迪克·安德森(Anderson, Benedict)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台北：時報文化出版，2004。
8. 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台北：麥田出版，2001。
9. 提姆·克雷斯威爾(Cresswell, Tim)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
10. 雷蒙·瓊納斯(Jonas, Raymond)著，賈士蘅譯，《法蘭西與聖心崇拜》(*France and the Cult of the Sacred Heart: An Epic Tale for Modern Times*)，台北：麥田出版，2003。
11. 劉大明，《「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公民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三、 外文專書

1. Bercé, Yves Marie.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The Social Origins of Rebellion in Early Modern France*. trans. by Amanda Whitmo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2. Corbin, Alain. *Village Bel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Doyle, William. *The Ancien Regim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2nd edition.
4. Forrest, Alan. *Paris, the Provinc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 Arnold, 2004.
5. Foucault, Michel.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Paris: Seuil / Gallimard, 2004.
 6. Furet, François et Ozouf, Mona dirigent.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dées*. Paris: Flammarion, 1992.
 7. Gérard, Alain (dir.). *Christianisme et Vendée*. La Roche-sur-Yon: Centre vendéen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2000.
 8. Levene, Mark. *Genocide in the Age of the Nation-State*, 2 vols., London: I. B. Tauris, 2005.
 9. Martin, Jean-Clément (dir.). *Religion et Révolution*. Paris: Anthropos, 1993.
 10. Martin, Jean-Clément. *Blancs et bleus de la Vendée déchirée*. Paris: Gallimard, 2001.
 11. Martin, Jean-Clément.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7.
 12. Plongeron, Bernard. *La vie quotidienne du clergé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974.
 13. Rapport, Michael.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3.
 14. Secher, Reynald. *A French Genocide*. trans. by George Holoch,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3.
 15. Tilly, Charles. *La Vendé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四、 期刊論文

1. Bianchi, Serge. “La déchristianisation de l’an II,”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 233 (Julliet-Septembre 1978), pp. 341-371.
2. Jones, Adam. "Why Gendercide? Why root-and-branch? A comparison of the Vendée uprising of 1793-94 and the Bosnian war of 1990s,"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8:1 (March 2006), pp. 9-25.
 3. Martin, Jean-Clément. "Histoire, mémoire et oubli pour un autre régime d'histoir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N°47-4 (octobre-décembre, 2000), pp. 783-804.

五、學位論文

1. 林弘毅，〈旺代戰爭與羅馬公教〉，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

六、網路資料

1. Renan, Ernest. "Qu'est-ce qu'une nation?" *La Bibliothèque Electronique de Lisieux*,
http://ourworld.compuserve.com/homepages/bib_lisieux/nation01.htm, 擷取日期：2009年10月31日。
2. Hugo, Victor.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Quatre-vingt-Treize*,
<http://www.gutenberg.org/etext/9645>, 擷取日期：2009年10月31日。

The Vendée War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Hong-yi Li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French history, culture diversity differed from the imagined community of the modern nation-state. In the case of Vendée, local identity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homogeneity between the provinces and Paris under the *ancien régime*.

Even 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French government tried to regenerate the French nation by misplacing the memories. However, Vendée tried hard to maintain their local identity and to transfer it into a resistant force.

The dispute of genocide highlights these two long held approaches still occupying the two sides of the spectrum of French Revolution. Furthermore, the local identity continues to fight against the general tendency of centralization.

Key words: French revolution, Vendée War, identity, genocide.